

评彼得一世的外交

[俄]H·H·莫尔恰诺夫 著
于春苓 译

外交在彼得的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是沙皇亲自签署国际条约的第一人。这一细节,如同彼得缔造了俄罗斯帝国的正规军、舰队和其它国家建制一样,表现了彼得建立了新的俄罗斯外交的事实。在外交领域里,彼得加强俄罗斯实力,将俄罗斯变为伟大强国的工作效果尤其显著。俄罗斯的迅速崛起使彼得的同代人及后人惊讶。外交,作为一种手段,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的武器,把对外政策付诸实施。外交有助于理解俄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一般都首先用彼得建立的军队和舰队的军事胜利的作用来解释俄罗斯的崛起。诚然,长年的战争伴随了彼得的对外政策。彼得在位的35年中,完全的和平总共也不过一年左右。这一事实本身就遮掩了外交的作用,而使外交很难与彼得伟大胜利的荣耀相比拟。外交行为不同于排炮齐鸣,不能引起巨大的反响。

的确,在难以置信的极短时期内建立了海军。不懈地把纳尔瓦溃逃惊恐中的散兵组织成强大的现代军队,建成了波尔塔瓦的辉煌胜利的军队,这些事实不能不使人惊愕。更为神奇的是圣彼得堡的建成。在这方面已经接触到了非常细微的、物质的现象。

外交是另外一回事。外交的成就在道德、心理和政治上作用于敌我双方。军事成就和外交胜利的不同性质和本质,很容易使对于对外政策举措的评价成为主观意断

的评价,成为经不住用船只、军队数量,伤亡数量,攻占城市和城堡数量以及所占地域规模衡量的评价。

成功地克服了整个欧洲(包括所谓的“同盟国”)阻止俄罗斯崛起的阻力,粉碎了建立反俄军事政治集团的各种企图,这是彼得外交最伟大的成就。然而,如同在战争中一样,在外交中也遭受过产生致命后果的惨重的失败、失误和错误。

彼得本人非常了解外交的意义。所以,他对于缔结尼什塔特和约的庆祝远远超过了对于所有奢侈隆重的军事凯旋。不仅只是理解,而且要用实际的理由解释外交行动的隐藏的秘密,这是历史科学的任务。

在研究彼得外交历史方面,C·M·索罗维约夫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把自己的六卷本《自远古时代起的俄罗斯历史》献给了彼得王朝。这一著作的大半部分都是写得外交活动的。

尽管某些人认为这样写俄罗斯历史有些不成比例,这样支配史料仅仅是客观反映现实存在的状况。但是,彼得本人正是这样支配自己的注意力、精力、意志和劳动。如果要找索罗维约夫的不足的话,这些不足大概在于其著作中主观描写的特点。不过,总的来讲,他对于彼得时期外交作用的具体评价是公允的。他写道,在北方战争激烈之时“外交斗争更加激烈而把军事斗争落在后面”。他承认在决定意义的危机时刻外交的优先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完全

有根据的。在分析 1718 年以前(距外交影响的顶点还很远)的国际形势特点时,索罗维约夫满意地指出:“过了许多年,进行了巨大的劳动、经历了可怕的灾难和意外的荣誉,整个欧洲成了俄罗斯外交的活动舞台,俄罗斯的利益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八年前,谁能想象到这种事?”

彼得时期及因彼得引起的出乎所有意料之外的事件的确不少。新一代研究彼得改革时期的兴趣也证实了这一点。苏联历史学家在马克思哲学历史学基础上,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进行了关于彼得改革时代和彼得外交具体问题的诸多有价值的研究。苏联历史学家研究的特点是极力以马列主义立场客观地、深入地评价彼得时代的事件。然而,尚未试图综合系统地研究整个时期的彼得的外交。

必须进行上述研究还有这样一种原因,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无情地揭露封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政策,揭露它们外交秘密的内幕,指出了彼得大帝外交的特殊意义。更为典型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留情的谴责了所有的欧洲君主,特别是俄罗斯君主的掠夺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评价彼得的对外政策活动,认为彼得的对外政策活动是彼得改革王朝的主要成分。恩格斯毫无美化集权君主之意地评价彼得说:“这位真正的伟人……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于俄罗斯特别有利的局势。他清楚地……看到了,指出了并开始实行俄罗斯政治的基本原则”。

卡尔·马克思专门研究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并雄辩地提出,与同时代人路德维希十四和查理十二的征战不同,彼得获得土地,历史地证明了是俄罗斯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当然应该属于俄罗斯。马克思认为俄罗斯的崛起是合理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彼得大帝天才无根基的即兴之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彼得外交基本方向和成就的正面评价不排除,而要求

用批判的方法对待彼得外交的研究。彼得进步的改革活动是在封建专制主义范围内进行的。尽管彼得真诚地认为祖国的利益、保障国家利益是自己对外政策的最高目的,但他的外交客观上是为当时正在兴起的贵族阶级和刚刚开始生成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彼得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最终是由当时俄罗斯社会和阶级的性质决定的。彼得的对外政策也符合了社会和当时处于过渡状态下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类型。封建社会的国际关系日益为行将替代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的国际关系所取代。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业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英国和荷兰等国的政策中。这些在诸如法国这类不太先进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也能反映出来。至于俄罗斯,则尽管它落后,但是,这里落后的封建性质的成份开始与新的、部分资产阶级的倾向相结合。因此,在彼得的政策中,争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新型的经济利益与纯粹封建特点如同沙皇婚姻似地奇妙地结合了起来。

17 至 18 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整个体系表现为新生的原则及规律同封建时期的陈旧的习惯复杂、矛盾地交互作用。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施了新时期的原则并开启了这一过渡的时代。如果,此前的国际关系参与者都是加冕者和君主,那么,在承认荷兰和瑞士独立之后,国际关系的参与者逐渐成为国家和民族。君主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主体,是以国家名义行事的。神权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大大减弱了,对外政策脱离了教会,国家日益变为非宗教的。因而,天主教与新教国家联合成集团和联盟,屡见不鲜。对于天主教徒、日耳曼皇帝来说,信奉天主教的路德维希十四逐渐变为敌人,而新教的英国和荷兰等国日益成为朋友。国家主权原则逐步被确定下来。国家主权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受国家神权和罗马教皇或日耳曼皇帝世俗权力的限制。最终,所有国家,不论宗教信仰,不论大小,不论所处何方,一律平等。

不过,上述这些进步的原则基本上还仅仅是一种理想,实际的国际关系还时常建立在旧时的封建习俗之上。一如既往,在外交关系方面,仍然是个人因素占主导地位,国王的更替时常导致对外政策的改变。在掌权的相互竞争的政党更替时仍能保持的政治稳定,如当今所发生的那样,在当时是新鲜的,然而已经是现实存在的现象(例如,民主党代替了托利党或者反之)。所有这些使得当时的外交实践极为复杂,也使得当今外交史学家的研究更加困难。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彼得及其战友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人的适应能力。彼得的外交利用了新的原则而同时以封建王朝旧式的阴谋诡计为基础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莫斯科的外交具有非同一般的灵活性。在这些方面,俄罗斯外交在关键时刻多亏了彼得大帝天才的洞察力。彼得在位时期最为重要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弥补和克服了在创建舰队、军队和某些工业等某些领域中的极端落后状况。在外交方面也发生了不亚于其他领域所发生的强烈的变化。

必然要提出当时外交道德水准这样一个问题。或许,读者们认为,描写外交家们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利用贿赂,收买外国活动家这些不体面的手段很不得体。然而,在当时,这毫无不体面之意。道义和礼节原则不过是外交辞令的一种形式。对于外交家来说,他个人的道德与他所供职的外交活动的道德内涵毫无共同之处。资产阶级外交经典作家哈罗德·尼克松曾指出,一般来说,“外交不是道德哲学体系。”关于17世纪的外交家,他写道:“他们贿赂宫廷人员,挑动并资助暴动,鼓励反对党,以极其有害的方式干涉他们所驻国家的内部事务。他们说谎、搞间谍活动,盗窃。”值得惊奇的不是俄罗斯大使们随身所带来成箱的貂皮和金钱,以便贿赂收买贪婪的外国高官重臣,而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坚信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公开为此感到羞耻。历史文献证明了彼得的外交官及彼得本人多次对于充满阴谋、欺瞒和谎言

的赤裸裸欺骗行为表现出愤怒。这类说法反映出宗法制度的天真和这些新手们的道义上的贞洁。然而,他们并未特别用心地遵守这种贞洁。因为俄罗斯需要生存,确切地说,必须在充满着敌对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与研究和解释彼得改革时代的其它方向和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要求考虑到整个彼得时代的复杂性,彻底地摆脱偏见、幻想和主观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彼得的方法与始于普希金、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别林斯基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的俄罗斯传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我们理解他们赞赏彼得大帝。彼得的形象是他们民族英雄理想人物的形象。不过,在他们热情的评价中也时常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进行的科学分析。普希金或别林斯基对于彼得的精彩的看法表现出深刻的历史鉴赏力。然而,很难接受赫尔岑把伟大俄罗斯沙皇誉为“戴着王冠的革命者”的评价。社会革命的科学概念所指的不是一般的任何一次激烈的变化,而是指阶级性质的改造。彼得,尽管他绝对不是保守派,但他没有有力地触动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的旧式的结构。

而且,俄罗斯与西欧相比较的社会落后加剧了。普列汉诺夫公允地指出,彼得大帝时代,在先进国家“农奴制权力的最后残余很快消失,”而在18世纪的俄罗斯,“对农民的奴役达到了顶点,出现了两个平行的而方向相反的过程。俄罗斯迅速地赶上欧洲,在许多方面走在前面,而在主要方面,在社会的发展上,俄罗斯却原地踏步。也正是这一矛盾造成了彼得改革的不彻底性和他的许多进步创举不能持久。农奴制度及政治上没有权力,甚至包括贵族本身也是这样,这就保存了俄罗斯落后的社会基础。传说中彼得的民主制只具有纯个人的性质。这种民主仅仅表现在彼得在亲近朋友的狭小的圈子中的举止上。彼得的确实地想要“服务于人民”。但实际上,他的“人民”在那个时代基本上仅是贵族的特权阶级,在这个阶级之外只是俄罗斯人广大

民众的“贻品”。

一般说来,对于那个久远时代人物和事件的所有评价,都因时间地点不同而具有相对的性质。所以,从阶级立场出发对于彼得批判的本身并不是要否认伟大历史的存在。在18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没有比彼得一世更加现实的、积极的、先进的进步力量的代表人物了。甚至,诸如独裁专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武器也成为进步的因素。因为,历史证实彼得大帝的行为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发展的利益。彼得的目的是为了拯救自己而克服俄罗斯的落后。这一目的解释了他所实行的所谓“极端”的统治,这一目的把这些极端手段变为客观产生的,不依赖彼得意志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不可避免的罪恶,彼得的错误和他性格上不良的方面,以至于他的毛病,这些都带有偶然性。而历史的必然性正寓于这种偶然性之中。因此,这些“偶然性”在任何一个开始真正科学评价彼得的历史学家眼里应该是第二、第三……第十位往下的。

列宁对彼得大帝及其作用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众所周知,列宁留下了一系

列关于俄国君主专制发展的主要时期,有关阶级、社会本质,进步的策略,农奴制度等具体的结论。确实,彼得独断专横的统治,以及对统治阶级、贵族、贵族阶层的控制,但在他的行动中很少出于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列宁认为,这是特别的环境下所必要的。

1918年的俄国正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当时,应该以任何代价调整、整顿国家极大的经济混乱,目的是拯救革命。列宁认为,为了学会大部分的资本主义技术及资本主义国家系统的组织方法,尤其是在德国的发展,这个运用是极其必要的。列宁写道:“我们的任务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全力以赴仿效它。为了比彼得更快地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我们不惜采用独裁方法,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斗争的手段”。

尽管列宁的“野蛮的手段”包含有谴责或不尽同意的语气,然而列宁对彼得大帝作用的评价是极其肯定的,因为彼得有坚定的目的,克服一切障碍,所以被列宁看做是适应局势要求的行动典范。

(译者单位:哈师大历史系)